

19 世纪后期英印土著情报员——“班智达” 在藏间谍活动论析^{*}

何文华

内容摘要：英印殖民统治长期重视战略情报获取，在 19 世纪后期西藏对外封闭和英俄中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印度测量局特别选派一批被称为印度“班智达”的土著情报员对以西藏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进行秘密勘察，他们以极小代价为英印政府带回了大量重要情报。“班智达”在藏间谍行为对英印殖民统治有重要实用性，西藏由此被清晰嵌入英印中亚地缘战略布局中。分析印度“班智达”在藏活动这一历史事件，能再现英印殖民机器中的隐蔽环节，也能反映英印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本质和战略设置。

“班智达”（Pundit），来自梵语“Paitya”，意为智者，印度北部常用于指精通梵文或有知识的智者。1886 年出版的英印词典《霍布森 - 乔布森》（Hobson-Jobson）首次收录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英国建构的西藏形象特征及其政治内涵研究”（18CME013）和博士后第 65 批面上资助基金“晚清驻藏大臣联豫及其筹办藏事研究”（2019M653835X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与英印间谍相联系的“班智达”词条，意指在 19 世纪后期被英印殖民政府选派的有一定知识且经过特殊训练的印度土著间谍，他们主要被派往欧洲人难以进入的中国西藏与新疆，以及克什米尔、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在英印政府档案中他们常由特定字母指代。自 1865 年纳恩·辛格（Nain Singh）经尼泊尔进入阿里到 1893 年哈里·兰姆（Hari Ram）及其子被遣往西藏，英印殖民政府利用印度“班智达”在中国西藏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秘密勘察活动，他们是英印政府获取我国西藏情报和制定所谓西藏政策的重要帝国工具。

目前，国外相关研究多为记述“班智达”代表人物及其具体活动¹，它们大都站在英帝国主义立场肯定印度“班智达”的间谍行为，称其为“探险”，斯特沃特（Jules Stewart）甚至将其视为“无可比拟的、勇敢的、坚韧的探藏无名英雄”，²这从根本上漠视了英印对中国西藏的侵犯。国内相关论著目前只略提“班智达”探藏历史，对该活动的形成、性质和影响等，均未作深入分析³。本文利用印度事务部档案、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和相关论著，分析英印政府利用印度“班智达”探藏政策的出台背景及其特点，认为英印政府利用土著间谍绝非地理“探险”，而是其精密布局的对中国西藏乃至全中国和东亚地区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班智达”的活动不仅为英印殖民扩张提供实用性，而且对英印建构相关的西藏知识也产生很大影响。此外，研究 19 世纪后期“班智达”的间谍活动，对情报信息在国家战略起重要支撑乃至决定作用的今天，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班智达”探藏政策的出台

西方人探索中国西藏的历史十分漫长，中世纪旅行家记载过西藏的风俗人情，近代西方传教士也进入西藏带回相关地理、民族和宗教信息，但这些信息无法满足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北部扩张的殖民需求。英国在普拉西战争后获得了南亚霸权，到 19 世纪中期已控制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地，但英国人对喜马拉雅山

1 国外相关论著主要有 Sarat Chandra Das, *Indian Pu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 Calcutta: Firma K. L. Muk., 1965;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1990;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td, 2006.

2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2006: 10.

3 国内相关研究大都在述及外国探藏史时提及该事件，如刘爱兰编译：《印度班智达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1）：35-38；沈福伟：《外国人在中国西藏的地理考察（1845-1945）》，《中国科技史料》1997（2）：8-16；房建昌的《近代西藏测绘史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4）：175-195。

北部地区了解甚少，其持有的西藏地图仍是 18 世纪中期法国人达安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根据探险家、商人等叙述绘制的，拉萨的准确位置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中还是有争议。

“自普拉西战争后，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就对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感兴趣”，“强硬派统治者随时准备军事征服，温和派则一直希望开通商贸联系”，⁴这主要受下述原因推动：首先，英印政府和军界长期认为俄国会通过控制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对印度形成钳形攻势，由于俄国在 19 世纪中期已相继占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汗国，其侵略锋芒直指帕米尔谷地，五六十年代俄国又通过蒙古与西藏地区建立起商贸联系，七十年代还因侵占了中国伊犁，在地理上更逼近西藏，因此英印政府坚信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会进一步南下印度；其次，英印政府被西藏大宗的茶叶需求所吸引，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商品也急需扩展原料市场，西藏特产的羊毛和矿产能为英国提供丰富的原料，于是伦敦议会中很多议员不断向英印政府施压打开与西藏贸易的大门⁵；再次，在全面崛起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深受一种精神刺激，希望把世界所有“未知地区”变成“已知地区”，西藏的闭关政策让英国人不断想象西藏隐藏着一种在世界其他地方已消失的神秘力量，这持续激起英国探索“世界屋脊”的激情⁶。由此可见，推动英印政府探测西藏的动机十分复杂，包括保证殖民地安全、实现印藏通商和征服未知领域等，其核心即英印殖民利益。

然而，自 18 世纪末期两次廓尔喀战争后，清政府在西藏施行的闭关政策得到更严厉执行。1876 年《烟台条约》虽然有了允许英人在中国西南地区游历的专约，但现实中地方当局仍然阻止所有欲进藏的西方人。时四川总督丁宝桢在藏事奏牍中上报过多起洋人入藏遭阻止的事件，“惟驻藏大臣在藏，亦不能尽管藏番之事，其中尚有驻藏大臣所派亦只是派拨番人，今既不肯令人进藏，即派之必不能听”“藏中番众以闻洋人入境，哗然聚兵拦阻，情势汹汹……立意驱逐洋人。”⁷在廓尔喀战争后一个多世纪，仅有少数

4 George Woodcock, *Into Tibet*, London: Faber & Faber, 1971: 32.

5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36.

6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ress, 1997: 7.

7 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辑室：《西藏学汉文文献丛刻（第三辑）·丁宝桢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499-500。

欧洲人进入了西藏西部地区,他们大多只能在喜马拉雅山边缘地带徘徊⁸。1811年闯进拉萨的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是此间唯一到达拉萨的英国人,但其著作到1876年才被编辑出版,且内容模糊不清。

最终,印度三角测量局⁹以秘密派遣印度“班智达”的方式成功绘制了西藏地图、搜集了相关情报。印度三角测量局是英印政府总军需官部下设机构,地方各局分属各军需分部,主要工作人员一般是工程与炮兵军官、制图师和绘图员,而非秘密间谍或特务。三角测量局依靠计程仪器、指南针和观察天文等三角测量学基本原理来获取相关地区的基本地理信息,进而为可能的军事目的提供服务¹⁰。测量局工作与“探险”活动有本质区别,除了像地理学者填补地理空白绘制地图外,更重要的任务是搜集和处理对军队或未来军事战争有价值的情报,调查结果包括文字性描述和数据信息。在19世纪英印势力向喜马拉雅山扩张的形势下,绘制出印度北部版图是三角测量局的永恒话题¹¹。

三角测量局雇佣印度土著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最早记录是1774年¹²,但一直是地方各分局行为,测量局总体上不希望印度人掌握测绘技能和北部敏感地区地理知识。第四任测量局负责人安德鲁·沃夫(Andrew Waugh)就不信任当地人,认为“利用土著间谍……是实验性的,他们绘制地图的能力与出发点不同于欧洲人,其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资金保障”。¹³1861年,陆军上将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担任了三角测量局第五任负责人(1878年兼任印度调查局负责人),面对英俄中亚竞争和英印迫切打开西藏大门的现实需求,他转而开始支持雇佣土著情报员。

8 包括英国人特雷尔(G.W. Traill), 1817-1821年;格纳德(Gerard)家族三兄弟亚历山大(Alexander)、詹姆斯(James)和格纳德(Patrick), 1817-1821年;威廉·韦伯(William Webb), 1816和1819年;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 1841和1846年。德国施拉君特怀特(Schlagintweit)家族三兄弟阿道夫(Adolph)、赫尔曼(Hermann)、斯拉金威特(Robert), 1854-1858年;法国人雅阁蒙特(Victor Jacquemont), 1830年等。

9 GTS(The 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 普拉西战争之后,印度设立了地图测绘机构,1818年正式命名为三角测量局,下属印度调查局(Survey of India),1861年测量局独立,1878年测量局与印度地质局、税务调查局再次合并为印度调查局。

10 Joseph E. Schwartzberg, "Review on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22 (Jul.) 1992: 164.

11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2006: 17.

12 1774年一名印度士兵被派往孟加拉和德干地区勘测地形。

13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2006: 24.

负责喜马拉雅山地带勘测任务的托马斯·蒙哥马利 (T.G. Montgomerie) 上校¹⁴是提出并派遣印度“班智达”进藏活动的关键人物。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俄国趁调停之机大肆侵占中国领土,英国由此希望拉拢中国政府共同反俄,不愿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于是从勘测克什米尔地区开始,蒙哥马利便被告知测绘行动旨在填补英印统治区域外的地理知识,并非刻意冒险或惹怒当地政府,他便长期注重维护与当地人的关系。1861年,蒙哥马利在参加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年会时,借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经验和已有土著情报员的成绩,阐述利用当地人的好处,同时提出进入西藏的计划,“由英印控制区域能进入的中国未勘测领土面积达 1400,000 平方英里……已知的仅 400,000 平方英里,剩下 1000,000 平方英里未知地带,由印度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刻已到来。”¹⁵该计划最终获得沃克尔和英印政府支持,1862年政府划拨 1000 卢比训练经费,蒙哥马利负责在台拉登设立专门的间谍学校,教授被选拔的印度当地人运用六分仪、水平仪、指南针等测量仪器,也学习以步伐测量距离或以沸点、天文观测计算海拔等秘密测量技术。随着 1863 年英印政府寄予厚望的,由上海和印度分别进藏的两支队伍失败后,经过严格训练的“班智达”便登上探藏历史舞台。

二、“班智达”在藏活动的特点

据英印政府档案记载,从 1865 年到 1893 年有十余名“班智达”多次进入中国西藏秘密活动,纳恩·辛格 (Nain Singh)、曼尼·辛格 (Mani Singh)、钱达斯 (Sarat Chandra Das) 和金塔普 (Kintup) 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乔装成商人或朝圣者,通过隐蔽的仪器和科学观测方法,把喜马拉雅山北部英人未知区域的情况,清晰地报告给英印政府官员、外交部门和伦敦相关部门。

印度“班智达”被招募的标准相对固定,他们多为库毛恩 (Kumaon)¹⁶地区有一定知识的人。纳恩·辛格是印度“班智达”的重要一员,他在英印档案被称为“一号”或“班智达”,与其来自同一家族的还有曼尼·辛格 (GM 或“二号”)、喀里·辛格 (Kalian

14 1839 年出生于苏格兰南部,1852 年加入三角测量局,1856 年开始负责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测量。蒙哥马利通过与印度王公搞好关系,于 1864 年完成对 7700 平方米未知领地的测量,此举得到印督康宁 (Charles Canning) 和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梅奇森 (Roderrick Murchison) 的肯定,1865 年他被授予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开始负责对喜马拉雅山北部地区的勘测。

15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1990: 25.

16 库毛恩是 1816 年英印通过《尼泊尔条约》获得的第一个与西藏接壤的领地。

Singh, GK) 及基申·辛格 (Kishen Singh, AK)。辛格家族成员都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部尼泊尔边境的库毛恩地区, 属菩提亚人 (Bhotia), 源于藏族, 与藏人有相同习俗和宗教信仰。他们在夏季可自由进入西藏, 以面粉、大米、英国制造产品与西藏的羊毛、盐、金沙、马种和硼砂等进行贸易交换。蒙哥马利 1862 年在给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谈到, “在执行亚洲探测任务时, 应招募那些能够安全穿越边境的土著, 他们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习惯在当地旅行或者贸易”,¹⁷ 与藏人相似的出身是“班智达”被招募的最重要条件。此外, “班智达”大都有一定文化基础, 纳恩·辛格是库毛恩一学校校长, 曼尼·辛格是当地官员, 二人皆有入藏经验, 斯拉金威特曾雇他们入藏, 评价曼尼“是一个聪明、诚实和值得信任的人, 对几种测量仪器都有很好掌握”, 纳恩“是一个聪明的人, 已经学会读仪器, 能够简单制作地图和简单英语书写”。¹⁸ “班智达”中教育背景最好的是钱达斯, 他是大吉岭一所寄宿学校校长, 该校藏语教师邬坚嘉措 (འདུན་རྒྱལ་རྒྱལ་མཚོ། Ugyen Gyatso) 也被选为探藏“班智达”。

印度“班智达”在藏行动十分隐蔽, 勘察方式灵活多样。“他们的记录是以诗句抄成的, 像记佛教祈祷文一样, 祈祷的念珠被用作计算器: 在旅行中, 每走一定数目的步伐, 就拨过一个念珠。他们的步伐必须精确, 每走一步都符合一定的距离。为了使其装扮成游商或虔诚的朝圣者, 他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为了掩盖真实身份, 他们都用了假名字。”¹⁹ 虽然“班智达”在藏活动中, 也多次遭怀疑和搜查, 但他们难辨的身份和经过改装的秘密装备很难被发现。随环境变化, “班智达”们还能变换测量方法, 如基申·辛格利用马匹步伐成功测绘藏北 230 英里的距离, 其准确性获得测量局肯定, 沃克尔评价基申是一个准确、值得信赖、勇敢和高效的情报员。为隐瞒身份, “班智达”们还蒙混于商人和朝圣者之列, 用行医、贿赂等多种方式前行, 如钱达斯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结交卫藏的上层阶级, 包括扎什伦布寺主事、江孜地方官员和拉萨的贵妇等, 金塔普则不惜长期充当贵族和寺院的奴仆。在三十余年的行动中, “班智达”被发现和遭处罚的风险极小, 无一“班智达”因此丧生。

印度“班智达”在藏活动是英印政府按计划、分重点执行的精密布局行动。“班智达”三十年间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60 年代至 70 年代集中在以拉萨为中心及其西部地区, 70 年代中期转向拉萨以东和雅鲁藏布江以东地区, 最后十年主要是沿雅鲁

17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1990: 78.

18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1990: 40.

19 刘爱兰编译:《印度班智达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 (1): 35。

藏布江流域地区²⁰。在此过程中,探寻与验证印藏之间不同通道是“班智达”活动的第一个重点,他们不断从台拉登大本营出发,经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和阿萨姆等不同地区往返印藏,秘密探测穿越喜马拉雅山的多条通道、寻找以拉萨为目的地的最佳线路。探寻布拉马普特拉河与雅鲁藏布江的关系是“班智达”活动的第二个重点。雅鲁藏布江藏语意为“纯洁的”(པ་ཕུང་ལྷོ་ཁྱེད་),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梵文意思相通,藏地流传的赤松德赞雅江寻子传说最早提及两者一致的关系²¹,但数百年来西方探险家和学者们都在寻找两条河流关系的准确数据。由于假想俄国可能会南下进攻,英印政府尤其关注孟加拉湾之上的这条河流是否能够通航并运送军队、物资,探明两条河流具体在什么地方汇合以及如何穿越喜马拉雅山一直是三角测量局的重要任务,此间纳恩·辛格、基申·辛格、金塔普等都曾以此为主要任务。

印度“班智达”本质上只是英印政府代价极小的“帝国工具”。皇家地理学会会长马克汉姆(Clements Markham)在赞扬印度“班智达”时说:“他们是英印政府值得信赖的雇员,技术高超、忍耐力强、行事坚决……假如他们是英国人,会渴望回到有大众欢呼、议会感激、政府特许的英国,但他们不会。他们又为何行动?”²²马克汉姆认为“班智达”是为了荣誉,但正如英国殖民作家吉卜林在《基姆》中所言,“在大游戏中,处于英国保护能力之外,我们假如死了,便彻底死了,甚至连名字也将从书中抹除”。²³“班智达”在政府档案中根本无名,他们在艰苦环境中数月甚至数年的坚持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纳恩·辛格成为间谍是为摆脱因其父结婚后又与有妇之夫私奔、被剥夺继承权后带给他的经济困境,曼尼·辛格也是为了测量局雇员的高薪。印度“班智达”作为情报员,从训练期开始每月可得16至20卢比薪水,行动中每月可获100卢比的固定薪水,有时每前进一公里还有1卢比补助,停滞期每天有4卢比补助,而且在行动前都可预支多年薪水,这远高于英印殖民统治下普通土著职员薪水²⁴。在1867年8月23日伦敦印度事务部还明确告知测量局,议会支持利用亚洲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探测,由测量局选派的雇员视其带回信息的价值,可获得额外金钱奖励。多名“班智达”在行动结束后都获得了地理学会和政府奖章,纳恩·辛格还获得库毛恩的罗西卡德(Rohilkand)村庄及其税收作为奖励。

20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1990: 267.

21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2006: 221.

22 J. Walker, "Four Years Journeying through Great Tibet." *Proceeding of the RGS*, 1885 (2): 91.

23 [英]拉迪亚德·吉卜林著,李斯译:《基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5。

24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2006: 80.

然而，纳恩·辛格的丰厚待遇仅为个例，探测成绩仅次于纳恩的基申在退休后仅获得三年薪水作为补偿，大部分“班智达”退休后都结局惨淡。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秘书的柔克义（W.W. Rockhill）谈到，“英国人即使仅取得班智达三分之一的成就，奖牌与奖章、职务或专业晋升、自由或各种视其为名人的荣誉都会纷至沓来，但作为一名土著探险者，他们能期待的仅有少量的奖金或微乎其微的身份提升。”²⁵考虑到西藏任务的艰巨，测量局还会向“班智达”施压以确保任务顺利完成，如纳恩在1865年第一次入藏前就签订了军令状²⁶。“班智达”完成任务以后，荣誉却常给予英国人，皇家地理学会前主席亨利·劳林森（Henry Rawlinson）认为“班智达”西藏行动的成功主要归因于英印军官的信任，如测量局负责人沃克尔、设立间谍学校的蒙哥马利和继承并成功利用“班智达”探测结果的托特（Henry Trotter）²⁷。在学会讨论给予1873年纳恩·辛格西藏之行金质奖章时，有学会成员建议奖章应给予制定计划的沃克尔。伦敦的印度事务部也明确谈到，“对蒙哥马利和沃克尔表现出的能力和判断力应给予高度赞扬，他们雇用土著情报员花费是如此小、成效大，以往取得类似成果需花费更多资源，乃至生命代价。”²⁸由此可见，土著情报员只是英国人为获实利暂时选择的代价极小的工具。

三、“班智达”在藏活动的影响

印度“班智达”把西藏各方面情报传递回台拉登后，三角测量局与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公开相关信息出现分歧。沃克尔、蒙哥马利等希望通过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公开更多信息以获得荣誉，沃克尔甚至提出将获知的地理信息与俄国主动交流以换取中亚其他地区的信息。英印政府则坚持“班智达”行动及报告只限在政府内部交流，认为公开信息会威胁此后以同样方式进藏的行动，俄国也会趁机利用相关信息并仿效这种秘密探藏行为，公开在敏感地区的探测行动还会为英国外交制造麻烦。伦敦印度事务部在给测量局的备忘录中明确强调“帝国利益至上”的原则，“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出于帝国事业或探险事业，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利益冒险，随着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不断了解，其面纱正在消退。毫无疑问，是测量局的军员派遣了这些土著，但我们必须找到危险最小的

25 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59: 288.

26 G. F. Heaney, “Rennell and the Surveyors of Ind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4, no. 3 (Sep.) 1968: 321.

27 H. Trotter, “Account of the Pundit’s Journey in Great Tibet from Leh in Ladakh to Lhasa, and of His Return to India via Assam.” *Proceeding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 no. 4. 1876-1877: 346.

28 印度事务部档案：L/P&S 6/305，印度事务部至测量局沃克尔通信，1877年3月8日，第15号电。

途径在文化或科学界公布相关成就，绝不能在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时使其行动陷入危险。”²⁹有关探测结果是否应公开的争论，充分说明“班智达”在藏行动并非普通的地理探险，而是一种间谍行为。正如一名英印政府官员坦承到，“简单地删除特定章节使其适合出版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反对的不是向世人公开某探险事业或经历，尽管测量局称此为‘探险’，但那确是我们的间谍行为。”³⁰

印度“班智达”秘密探测西藏首先有利于英印政府的军事需求。“班智达”在藏活动范围北及柴达木盆地边缘、敦煌、青海湖等地；东及波密、康区巴塘等地；西及阿里、克什米尔边境，他们首次用三角测量技术观察测量在西藏经历的路线的距离和方向，并结合指南针方位、天文布局、经纬度计算以及对地形、道路和河流等的详细记录，形成英印军事部门所需的报告。印度“班智达”对拉萨、康定等重要城市的海拔位置测绘、各线路距离测绘十分准确，英印当局视其为“最值得信赖和准确的观测者”和“科学的探险家”，相关数据在后来英军侵藏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随荣赫鹏侵藏的记者兰登（Perceval Landon）感叹，“他们绘制的地图是如此准确和值得信赖，”“这些孤独的情报员在亚洲的探险，是荣赫鹏军队以外，最重要和最值得书写的”。³¹“班智达”还用文字直接记录藏军的组织和配置情况，如钱达斯详细记录了拉萨的常规军、后备军以及紧急情况下可供调遣的康区或安多军队数量；来自下层社会的藏军的落后装备和分布；驻藏大臣与噶厦政府之间对藏军的控制权等，钱达斯认为藏地的物资主要用于供养僧众，因此西藏几乎不存在真正的战略防线³²。在“班智达”眼中，藏地的很多信息被转化为军事行动中的机遇或障碍，如纳恩·辛格和钱达斯看到西藏有大量的羊群、驴子、骡子和马群等牲畜，认为它们不仅是西藏的财富，而且是英印未来军事行动的重要补给³³。

“班智达”带回的信息由测量局编辑为军事服务的指南——路线书。它们按照从一个地名点到另一地名点的日行军来编辑，一般注有道路状况、旅行时间、可供马和其他牲畜的饲料、海拔及与沿线旅行有关其它资料，是军事情报的标准范本。路线书是英国殖民亚洲的一种独特知识类型，“被测量地区的距离被英里填充，温度用华氏温度来填充，异质性的地形特征用已知的固定的点来导向和命名，口头的地名逐渐采取一致性的

29 印度事务部档案：L/P&S/7/10，休谟（A. O. Hume）至沃克尔通信，1876年10月5日，第46号电。

30 印度事务部档案：L/P&S/7/10，F. H 备忘录，1876年4月13日，密16号。

31 Perceval Landon, *Lhas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Ltd., 1905: 22.

32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1990: 178.

33 H. Trotter, "Account of the Pundit's Journey in Great Tibet from Leh in Ladakh to Lhasa, and of His Return to India via Assam." *Proceeding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1, no. 4, 1876: 348.

转写形式。和印度发生的情形一样，亚洲多层面、多角度空间的地形学由自然的要素比如平原、高原、山口和山峰、河床和海拔抬升等组成，被置换到路线书的平面及其随带的地图和图表上。”³⁴ 相关的情报使西藏这一真实地理空间被转译成一种英印政府可计算和监视的领土，军需部门通过计算和运作，最终能在不离开西姆拉的前提下，对西藏进行有效的兵力展布。此外，“班智达”还与英国驻华公开机构有联系，如 1885 年钱达斯被派往北京公使馆协助马考莱（Colman Macaulay）的西藏之行，英印秘密情报部门与英国驻华公开机构密切交流，为英国制定西藏政策和对华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其次，“班智达”的西藏间谍活动还验证与激发英印政府对西藏更多的经济诉求。从英印第一任总督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开始，西藏就被视为中英贸易的后门和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1870 年纳恩第二次进藏就是为探明托克雅砻（Thok Jalung）地区的金矿，通过近半年的调查，他探明了矿地位置、储量以及与噶厦政府的联系，认为以水淘金的原始方法、噶厦政府税收的增加和藏人的宗教信仰是 19 世纪西藏黄金出产减少的原因；1878 年基申的西藏之行不仅找到了印藏贸易新通道，他还记录了藏人喜欢英国毛织品、刀具和日用品、烟草和靛青，但不包括茶叶的情况，于是英印政府认为“在距离大吉岭几百英里的一个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茶叶的地方，要从距其 1200 英里以外的中国进口茶叶，是因无知和根深蒂固的贸易传统所致，这是对印度的一种凌辱。”³⁵ 钱达斯再次证实了克什米尔地区与西藏之间的山羊绒贸易，还得出清政府是阻止贸易发展主要障碍的结论。于是根据“班智达”带回的情报，英印政府官员开始设定冲突情节，如在英俄竞争中抢占贸易先机、消除清中央政府对印藏贸易的阻碍等，由此一些侵犯性的保卫印度安全的“前进政策”得到证据支撑，最终羊毛、茶叶和黄金等都成为 1904 年荣赫鹏侵藏的借口。

第三，“班智达”在西藏的活动影响到英国有关西藏的知识构建，包括关于西藏的知识层面和对西藏的认知观念层面。钱达斯被誉为“藏学家”，他不仅编纂了英藏语词典、藏语语法词典以及有关西藏宗教法令等著作，还从西藏带回在印度早已失传的两百多卷梵文手稿和木版印刷文书，以及一些从未被外界知晓的萨迦派文书，这些古老的材料使西藏后来被莫拉维亚兄弟会构建为堕落的“他者”，同时被耶稣会想象成保留了宗教真谛的“他者”。钱达斯还认为“不追求享乐、人文追求（an unartificial gentleness of disposition, and humanity）是藏人永恒的品质。他们乐于奉献，上层阶级十分谦逊，让

34 何伟亚：《19 世纪英国军事情报与亚洲地缘战略的建构》，《四川大学学报》2007（1）：121。

35 J. Walker, “Four Years Journeying through Great Tibet.” *Proceeding of the RGS*, 1885 (2): 91.

人发自内心的尊敬；藏人也不歧视女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并不粗鲁、虚假。”³⁶ 这种认知对后来西方构建“香格里拉”西藏形象有一定影响。以“班智达”为原型，英国人不断创作出在西方影响深远的多个与西藏相关的人物，如吉卜林（Kipling）在《基姆》（*Kim*）中虚构了寻找神秘河流的故事，并且以钱达斯为原型创作了穆克吉先生（Mookerjee）、希尔顿（James Hilton）在《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创作了高深莫测的喇嘛、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 Blavatsky）在神智论作品中创作了钱德拉（Chandra Cusho），她还以邬坚嘉措为原型创作出顿珠（Ten-Dub）。这类著作中相关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虽具有东方人身份，但却与西方关系友好，他们深入西藏或者本身就是藏人，类似的“创作”刻意隐藏了“班智达”入藏的侵略实质，是英国作家对国家殖民扩张行为的辩护，进而影响了外界有关西藏和西藏对外关系的认知。

结 语

19 世纪后期英印政府在英俄竞争激烈和抢占西藏殖民先机的背景下，暂时抛开对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偏见，利用印度“班智达”以微弱的代价获取了西藏各方面情报。印度“班智达”在西藏地区三十余年的活动，最终使西藏成为英印政府军需部门在西姆拉就能实现军事展布的可计算空间，其行为绝非英印政府或国外某些著作中宣称的“地理探索”，而是有直接服务于军事行动的间谍本质，后来荣赫鹏军队便直接利用相应情报对西藏实施武装侵略。值得重视的是，土著情报员难辨的身份及其隐蔽的勘测仪器为其提供了基本便利，但在 19 世纪后期，清中央朝廷因实力下行而对外采取妥协态度，对待被抓获的刺探者多作遣返的宽松处理方式也应值得反思。在情报工作对国家战略起重要支撑乃至决定作用的今天，以严厉的态度打击任何间谍行为，利用各种措施切实布防严密的反间谍网络十分重要。

◆ 何文华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四川省社科院与四川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

36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 1990: 205.